

钩沉

范成法师与大藏经⁽¹⁾

□ 徐继康



范成法师

1958年的冬天，范成法师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如东县掘港西方寺。下了车，他没有坐下来休息，而是拄着拐杖到处走。他的一条腿不好，五年前乘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大会，途中一个急刹车，他从座椅上滑落，大腿立即骨折，虽然在北京经过数月的治疗，但毕竟上七十的人了，恢复起来不如年轻人。他还有严重的气喘病，走一会儿气便接不上来，必须停下来缓一缓。而这一天，法师似乎不想停下脚步，喘着气把寺院前前后后都走了个遍，然后坐在一旁默默地不说话。

他早就得到消息，知道西方寺被改为中学校舍，心里也早有准备，当亲眼看到昔日熟悉的环境面目全非时，心头还是别有一番滋味。金刚殿、大佛殿、观音殿、珈蓝殿、后殿、祖堂、斋堂、敞厅、法堂、方丈室以及后院的紫竹林、放生池、菜园子，统统换了模样，有的已经被拆除，仅留了的两间房屋作僧舍，还用围墙隔着，僧侣们也都被遣送回了家。这座建于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的皋东庙宇，素以清幽著称，时见于前人的诗文之中。根据《修西闻见录》记载，太平天国时期，因鸣皋和尚法器时鸣，当时的寺庙中，仅掘港西方寺与上海一粟庵没有遭到侵扰，还帮助解决了不少僧伽的困难。如今变成这个样子，谁看了都会感慨一番。其实不仅仅西方寺，西隔壁的西三元宫、淮提庵也一并改作校舍，这还算好，东边的地心庵、二贤祠已经是一片平地了。三百年来，这里的庙宇建了修，修了毁，毁了重建，反反复复，今后会如何？范成法师有点茫然。

解放后，受一位荣姓居士的邀请，他从常州武进安家舍德胜寺移锡苏州沧浪亭结草庵，将庵内数亩空地辟为菜园，过着农禅合一的简单生活。此后，他两次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凭着极高的声誉，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但不论是兼报恩寺的住持，还是苏州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的主任委员，也不论是苏州市文管会的委员，还是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会的主委，更不管是否政协委员，还是人民代表，即便在去年夏天刚刚被划归为“黑五类”，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都没有过分在意，他心里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编纂《人民大藏经》。自从上一年在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发宏愿要编一部《人民大藏经》以来，得到众多缙素的赞同，他便汲汲于此。此次回到西方寺，就是来查找收藏在这里的一部清代乾隆《清藏》（又名《龙藏》）影印本。然而，当他来

到由他创办的僧伽图书馆时，却发现这里的藏书和文物，已经空空如也。原来包括《清藏》在内的十六万册图书，被人装了满满三大船，运到南通县废纸厂去，早已化为了纸浆，所藏的佛教文物也已损失殆尽。望着喧嚣中偌大的寂寞，法师心中一片悲凉。

不久，寒流骤至，内外交并，凉彻肺腑，他喘疾复发，徒孙宝惠想送他回苏州。他淡淡地说：“生有处，死有地。我自西方寺生，仍在西方寺终。”12月17日，法师沐浴更衣，跏趺而坐，于念佛声中至辰时，一代高僧就此圆寂，世寿七十五岁，戒腊五十四年。骨灰由徒孙送至苏州林岩山的四众塔。

“我自西方寺生，仍在西方寺终”，这可能是范成法师留在尘世间的最后一句话。他确实与掘港西方寺因缘甚深，二十二岁那年，他去镇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戒期圆满后，便来到了西方寺，一直到最终在此坐化，前后达五十余年之久。他最初来西方寺，因为这里住持悉融和尚是他的剃度师。范成俗家姓季，清光绪十年（1884）生于如皋南郊，七岁时在县城东门外的崇善庵出了家，所依的就是悉融和尚，取法名果宗。小小的他，跟着师父后面读书认字，礼佛诵经，如是者十余年。等他到了西方寺后，依旧在师父的座下，晨钟暮鼓，禅门课诵，打坐出坡，应赴经忏，如此又过了四五年。

宣统二年（1910），江苏省僧教育会在南京三藏殿开办了江苏僧师范学堂，由月霞法师出任学堂监督，这是我国最早以新式教育培育僧才的学府之一，悉融和尚认为机会难得，让范成负责南京。自学堂开办以来，一时名人遍天下，仁山、智光、开悟、惠敏这些后来弘化一方的佛门法将，与范成皆为同学。翌年，月霞因受邀到洪山讲经，学堂监督由谛闲法师继任。老师舌染莲花，弟子妙得于心。在校期间，范成潜究经典，参悟幽微，誓愿弘扬佛法，荷担如来家业。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受战事影响，僧师范学堂停办，范成离开学校，仍然回到掘港西方寺。第二年，民国肇建，范成奉师命出任西方寺第十代住持。这一年他二十八岁。

范成素来推崇“农禅生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融禅于农、以农悟道。他率领僧众开垦了寺产的四十多亩荒地，种植庄稼，自给自足。那时他已有一定的声望，一些佛事多请他主持，据印光法师记述，民国十五年（1926）冬，马塘居士赵尊仁身婴笃疾，力疾提倡佛七，入会念佛的有四十多人，而主七者就是范成。皋东名士邓际昌晚年一心崇佛，从山东任满回到故里马塘后，捐私产创办“邓氏义庄”，范成与他私交极好，曾撰《邓璞君义庄记》。受之影响，他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时常出外行脚募捐化缘，修“掘虹路”，建“通利桥”，造“纳骨塔”。此外，范成还做了两件前无古人的事，一个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创建了皋东私立僧伽图书馆，馆藏佛教大小乘经律论典籍、儒家经史子集、地方志乘等各种图书十万余册以及各类报刊杂志十数种，设专人管理，对社会开放；另一个是民国十八年（1929）他策划设立一座佛教文物馆，收集金石、经像、法器、供具等佛教文物，以供收藏观赏。然而就在后一件事上，师父悉融和尚与他意见相左，大概是要花不少钱，需卖出部分寺田，师父有点不情愿。这也本属正常，谁知消息传到当地乡绅的耳中，某些人顿时来了劲，对他指指点点，出家人不好好读经念佛，却热衷这些乱七八糟的社会事务，这像什么话！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如皋县保安团的高营长部驻扎在西方寺，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属员吵着嚷着要出家，高营长就指责范成瓦解军心，范成还

没辩解几句，高营长就很威风地将他押解游街示了众。

小小的掘港一下炸开了锅。就在市民嘈杂的议论中，范成悄悄地离开了掘港。

多少年以后，当回首往事，我们真心要感谢那一年的无妄之灾。如果悉融和尚像以往一样赞同他的建议，如果掘港那些乡绅对他彬彬有礼，如果高营长很有风度地听完他的解释，他肯定还在西方寺做着他的住持。那么，就没有他与大藏经的种种奇缘，没有后来中华文化史上的惊天大发现，当然更没有一代高僧大德范成法师。这世上有些无妄之灾，也许就是老天刻意安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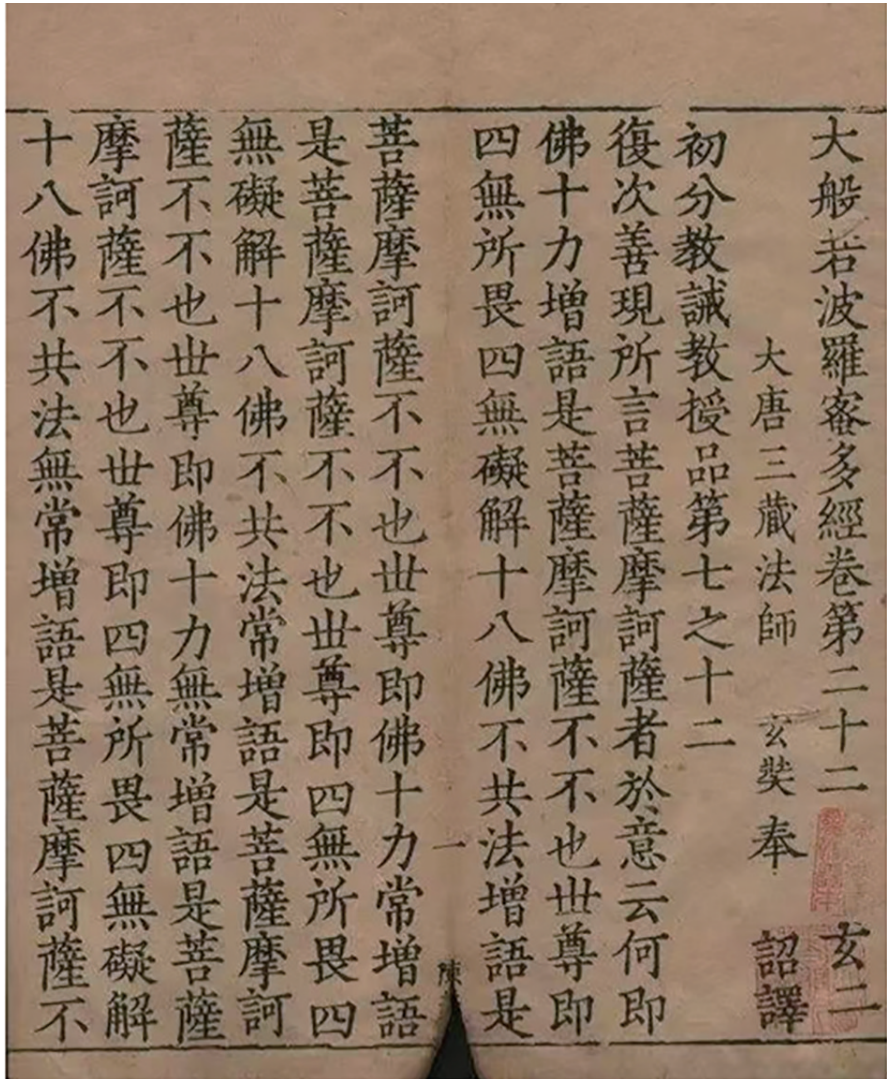
二

范成来到了上海，此时上海的佛教界，正在酝酿一件大事。

民国二十年（1931）夏，陕西大旱，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到西安地区放赈，在主持修葺佛塔寺庙的过程中，见到了传说中开元、卧龙二寺所藏的南宋《磧砂大藏经》，大为震惊。朱庆澜就是朱子桥，是当世有名的大居士，他深知这稀世法宝的价值，决定影印发行

长、康寄寓居士说明派员赴西安摄影之困难，请将‘宋藏’全部派员护送到申，并在申监视摄影后运回。”其实，在这一年春天朱庆澜初往西安放赈之时，范成法师即与之同行。此次选中他再赴西安，一是因为他对西安当局来说不是陌生人，方便沟通交流；二来乘机探访陕晋的名山古刹，期望能够找到其它善本来增补；三是他通晓佛学经典，精于版本鉴别，由他来整理《磧砂藏》的缺失，确是最佳人选。

大藏经，又名一切经，是古代对佛教所有典籍的总称。我国第一部大藏经是始刻于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的《开宝藏》，此后历代皆有印刻，版本繁多，《磧砂藏》就是其中一种。它刻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一直到元朝至治二年（1322），历时百余年方才完成，辑录了两晋至宋佛家典籍一千五百二十一种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因刻印于平江府陈湖磧砂延圣院而得名，是佛经中的经典。由于年代久远，此本流传稀少，即使偶有传世，人们也往往目不能识。比如西安收藏的这一部，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民国十二年（1923）十一月二十一日，康有为到西安卧龙寺讲学，在积灰寸许



南宋刻本《磧砂大藏经》

流通。回到上海后，与叶恭綽等人成立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他与叶恭綽为正、副理事长。随即与陕西当局接洽商谈，双方议定拟派摄影人员到西安进行专业拍摄，后又商量将原本借运到上海来摄影。因为《磧砂大藏经》多有残缺，需派一人去西安先行整理，他们选定的这个人正是范成法师。

在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召开的第三次的理事会上，范成法师被补推为常务理事，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携本会公函往西安，与杨虎城主席、李范一

的藏经楼中，发现了满满两大橱古旧佛经，精于鉴赏的他，一眼就看出这破烂不堪的经卷，竟是十分珍贵的宋元版《磧砂藏》，当即不动声色，提出以新印的三部藏经来换取这些旧版残经，第二天便急急忙忙带人来转运，结果引起陕人的强烈不满。“康圣人盗经”的故事迅速在士林传播，甚至有人起诉到法庭，搞得康有为很狼狈，无奈之下，只好将已经取走的那部分送了回来。但经过这么一折腾，《磧砂藏》又损失了不少。（未完待续）

回忆

洋岸街的荣衰

□ 田汉臣

十字街北头有洋岸庙，是湖南人明道和尚在镇江寺庙犯了庙规，后经杨姓女人介绍到洋岸，当时只有一间小庙（在陈济民后边），几个泥菩萨。后来洋岸兴旺了，当地富人钱金发娶了3个老婆，均无生育，想做善事，拟想把洋岸庙重建扩大，聘约了明道和尚到环镇，请了叫心慈的和尚到洋岸，选定了新址，钱老板一口承诺出全资的1/3。于是两和尚发动当地善男信女、大户富商自愿捐资，花了3年时间建成四关厢大庙，庙内数十尊菩萨和金脸城隍，从此香火旺盛。随着街上商业的不断发展，每年的庙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甚是繁华。当时在街上行走，提着竹篮子根本无法行走，只好举在头上方可前行。

民国19年（1930）4月上旬，如皋东乡第一位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张庭谱，在南通县二窰、北兴桥一带找到了红十四军一支队二大队，与该大队负责人陈宗恒、冯步洲取得了联系，双方确定在洋岸建立联络点，相互配合开展武装斗争。当年度，张庭谱重建中共下漫灶支部，任支部书记，吸收一批青年农民参加红军队伍，并把筹集到的3万元交给了红军购买枪支。7月12～25日，张庭谱配合红十四军一支队二大队在大队长陈宗恒的指挥下，取得“三战三捷”的辉煌战绩。

民国32年（1943），侵华日军占领了洋岸街。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率领当地军民给日伪军以迎头痛击。民国33年（1944）5月初，新四军一师三旅特务四团突破日伪封锁线，进入“清乡”区作战。11日，特务四团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击退从童句据点出扰的日伪军。第二天一举拔除“童句据点”。该战斗的胜利，吹响了抗日反据点斗争的号角；接着谢家渡等战斗的打响，形成对日伪军反击的强大攻势。日伪军狗急跳墙，垂死挣扎，对洋岸实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三光政策。民国34年（1945）正月十四，日伪军得知丁金华车行（因丁师傅会烧焊），名为车行，暗为新四军修理枪支，便一把火点燃了该车行，隔壁是花行，瞬时火烧连营，几乎把洋岸街70余家商店全部烧毁，直至向北烧到银杏埭子的大路才被阻断。路西许旺福糟坊等三四家和一座洋岸庙幸免，其余均化为灰烬。从此，洋岸街不成街，市不成市，萧条冷落。至今仅有一段碎石残道，留住了历史的血色底版。

公共场所不喧哗

轻声细语讲文明